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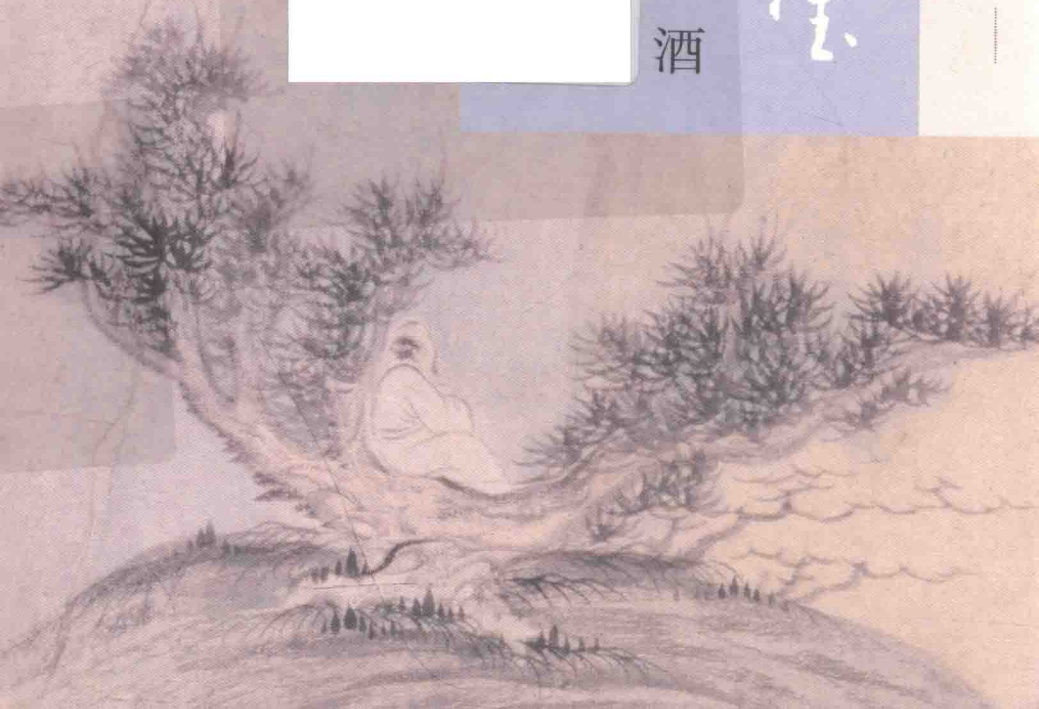
—— 迦陵说诗 ——

# 葉嘉莹

说陶渊明饮酒  
及拟古诗

叶嘉莹 著

中华



— 迦陵说诗 —

叶嘉莹 著

葉嘉莹

说陶渊明饮酒  
及拟古诗  
(附音频)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附音频/叶嘉莹著. —北京:  
中华书局,2018.6

(迦陵说诗)

ISBN 978-7-101-13157-4

I.叶... II.叶... III.陶渊明(365~427)-诗歌评论  
IV.I207.227.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9939号

---

书 名 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附音频)

著 者 叶嘉莹

丛 书 名 迦陵说诗

责任编辑 余瑾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4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157-4

定 价 32.00元

---

## 「迦陵说诗」系列出版说明

叶嘉莹先生别号迦陵，《楞严经》中有鸟名迦陵，其仙音可遍十方界，而又与“嘉莹”音颇相近，故取为笔名。此鸟之仙音邈不可闻，但“迦陵”先生之德音，却数十年萦绕在讲坛之上，滋润着世人的心灵。叶嘉莹先生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写诗的。”叶嘉莹先生也是用整个生命去传承和传播她所钟爱的古典诗词。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北京教中学开始，叶嘉莹先生从教至今七十年，诗词几乎已成为她的信仰，她生命的支撑，虽“一世多艰”，仍“寸心如水”。诗词向来无关于国计民生，却关乎人的心灵、品格和情趣，叶嘉莹先生1979年首次回内地讲学时，曾挥笔写下了“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就是要将诗词的美讲给国人听，她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中华书局2007年推出“迦陵说诗”系列丛书，全八册，至2008年出齐。本丛书是叶嘉莹先生不同时地的讲演集，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文艺理论，分专题讲授赏析古典诗歌。丛书推出后，深受读者欢迎，多次重印。今年是叶嘉莹先生九十四岁诞辰，我们特推出全新编辑设计的版本，以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意。其中的《好诗共欣赏》因版权问题不再印行。

本丛书的内容皆为演讲记录稿，是叶先生在讲坛上的即兴发挥，因此在演讲过程中凭记忆的引用、录音整理过程中产生的失误以及排校中

出现错误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故此，我们在丛书出版十一年后，推出此新装本，对文字内容进行了重新审定，逐一核对引文，对误记及编校讹误进行订正。其中《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因当年整理时较匆促，未能尽如人意，此次出版，将不同时期全部同题演讲录音重新整理编辑，使内容更加准确充实。

同时，除《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外，其他几种特制作同题演讲音频资料，需说明的是，因这些录音来自不同时期，整理时是以一次讲演为基础，整合其他不同时地的同题演讲，因此录音和书稿文字并不完全吻合。而且有些录音由于录制场地及年代久远的原因，音质不高，但能亲耳聆听诗词大家的讲解，已是一件足够幸运的事。点滴之言，亦足以撼动诗心。让我们跟随迦陵先生的脚步，去聆听汉风唐韵，去体悟诗词的妙境吧！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8年5月

## 「迦陵说诗」系列序言

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我写一篇总序。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应排列如下：

-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 四、叶嘉莹说唐诗
- 五、好诗共欣赏
- 六、叶嘉莹说诗讲稿

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1997及1998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过《前言》，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讲演之时地则同出于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不同，整理讲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后者还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叶嘉莹作品集》的第二辑

《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未包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讲授的时地并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前者是于1984年及1993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讲演，整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词讲录》一辑之中。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2003年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2003年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国、加拿大及中国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仍都不失为一时、一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我大多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都是临时拟定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多失误。何况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

水平也不整齐，所以其内容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1. 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收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2. 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诗词讲演集》）

3. 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一次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4. 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5. 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大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6. 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7. 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这是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8. 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9. 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10. 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同上）

11. 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12. 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 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即如前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题为《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容及出版情况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主要是为了向读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重复之处。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相近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应该删节才是。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这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有时自不免有失误，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晰，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三则一般说来，古诗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此次校读中，虽然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的共鸣。早在1996年，当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汉魏六朝诗讲录》一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迦陵说诗”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我现在仍愿以这两句诗作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2006年12月

## 前言

本书共收录有关陶渊明诗的讲录两种，其一是《饮酒诗讲录》，这一组诗一共是二十首，由于我在金佛寺最早的一次讲演中讲的就是其中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所以在后来的系列讲演中就没有再专讲这一首，只是在开始介绍《饮酒》组诗的时候对这一首诗回顾了一下。因此，在讲完第四首“栖栖失群鸟”之后接下来就讲第六首“行止千万端”了。我希望保持这一系列讲座原有的脉络风貌，所以就没有改动原讲演的次序，因此这一组诗的目录中没有第五首“结庐在人境”。

关于这二十首饮酒诗讲录的前后经过，我在本书开端所附录的《〈诗词讲录〉序》中曾有详细说明，读者可以参看。

至于《拟古诗讲录》，则是迟至2003年的暑期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另一次系列讲座的录音整理稿，虽然时空及听讲者已完全不同，但都是我对陶渊明诗所做的系列讲座，因此合编为一册，而题名为《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叶嘉莹

2007年1月

## 《诗词讲录》序

“诗词讲录”编目内，收录了我的六种讲课录音整理稿，其中有三种且分别为上、下两册，故综计之共有九册之多。记得我在1996年为《我的诗词道路》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曾经自我反省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我自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的生涯，至今已有五十四年之久，不仅从来未曾间断过，而且往往总是同时在多校兼课。即如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刚从大学毕业，就在北平担任了三个中学的五班国文课；五十年代以后，我又在台湾的台大、淡江、辅仁三所大学担任了诗选、文选、词选、曲选及杜甫诗等多科的教学；还同时担任了教育电台大学国文课的广播教学；及至六十年代中，教育电视台成立，我又兼任了古诗的电视教学；七十年代到加拿大任教后，虽然不再有兼课的情况，但我却又开始了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的忙碌生活。曾先后在大陆十余所大学讲过课。九十年代退休后，更曾应邀赴台湾地区各大学、大陆各大学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过全年或者半年的客座教学。近年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聘筹建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且担任了所长的的工作，并亲自带领研究生。不过，我教学讲课的时间虽已有五十四年之久，但讲稿之被录音且被整理发表，则是二十年前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才开始的，

关于这些情况，我在《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的《前言》中，已曾有简单的记述。总之，我早年在台湾教书时，可以说从来没有过要将之录音并整理成书的念头。《阮籍》一书之存有录音，是因为那原是当年在台湾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的录音。不过其被整理成书则已是三十余年以后的事了。至于我的讲演之第一次被录音整理发表，则是由于在1978年的夏天，我曾应邀参加了美国东岸一些爱国的文艺工作者所举办的一个夏令营的聚会，在聚会中我所做的题为《旧诗的批评与欣赏》的一篇讲演，曾被录音并整理发表于一册题为《海内外》的杂志（详情可参看《阮籍咏怀诗讲录·前言》），而且自此以后，《海内外》的编者尹梦龙先生遂要求我把所有的讲课都做成录音交由他们去整理发表。这实在是我之所以有这些录音讲稿的最早的缘起。在《诗词讲录》这一部分中所收录的《迦陵说词讲稿·下卷》内的大多数文稿就都是当年在《海内外》所发表的录音整理稿。此外《汉魏六朝诗讲录》上、下两册，原也是为应《海内外》编者之要求而做的讲课录音，但因这一系列的录音带数量极多，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被陆续整理完稿，而那时《海内外》杂志已经停刊了。适值台湾的《国文天地》向我约稿，于是我遂将这一部分讲稿交给了他们去分期刊载，直到最近才全部刊完。此外在《诗词讲录》这一部分所收录的作品中，还有一册较具系列性的录音整理稿，那就是分为上、下两册的《唐宋词十七讲》。原来在1987年的2月，我曾应北京五个文化单位的联合邀请，为他们所举办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做了十次讲演，讲了五代及北宋一些名家的词。结束以后因主办人及一些听众意犹未尽，遂又由沈阳及大连的两所院校邀我去继续讲了七次南宋名家的词。其后由三地的主办人分别将各次录音整理合编成书，那就是分为上、下两册的《唐宋词十七讲》（请参考该书《前言》）。而与此《十七讲》相配合的，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音像部出版的题为《唐宋词系列讲座》的一套录音带和一套录像带。私意以为如果能配合录音带或录像带去阅读《十七讲》一书的话，也许更能体会到一种如我在《作品集·序言》中所说的“感发的效果”。因为增加了声音和形象，较之纯然只用文字传达的效果一定更好，不过如此有心的读者可能并不多就是了。

除去以上所叙及的四种《讲录》之成书的特殊情况以外，还有一册成书情况更为特殊的讲稿，那就是《陶渊明饮酒诗讲录》。原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教的学生中，有一位从香港来的名叫蔡宝珠的女同学。她既喜爱诗词，同时也笃信佛教。每逢学校放了寒暑假，她就到加州一处名叫万佛城的法界大学去静修，有时她也携带一些我讲课的录音去聆听。她学佛的师父就是开创万佛城的宣化上人。宣化上人在北美曾创建有多处佛寺，温哥华也有他所创建的一所金佛寺。1984年夏天，有一次宣化上人到金佛寺来讲道，我就随蔡宝珠同学一起去听讲，谁知上人登上讲坛后，却一定要邀台下的我上去讲话，我推辞说我对佛法并无深知，不敢妄言。上人说不一定讲佛法，随便你讲什么都可以。在坚辞不获下，我只好登上了讲坛。我心中自忖在佛寺中该讲些什么才好呢？由于金佛寺坐落在温哥华的中国城地区，寺中的清修者竟能对外在喧闹杂乱的环境充耳不闻，于是我就想到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两句诗。这两句诗出于陶公《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于是我当时就把这一首诗做了简单的敷衍讲述。岂料由此一讲，遂被宣化上人邀定每周两次要到金佛寺去讲陶诗。于是我就只好重新开始把陶公的《饮酒二十首》从头讲起。讲到第十八首时，因为我要回中国去讲学的日期已经到了，于是就把课程停止了没有再讲下去。及至九年以后，那位蔡宝珠同学已经正式在万佛城受戒，她又坚邀我去加州万佛城把余下的两首《饮酒》诗也讲完了。而从开始到结尾，他们在温哥华与万佛城两地都做了录音。现在这一册《陶渊明饮酒诗讲录》就是由此一因缘而获致的结果。在《迦陵诗词稿》中曾编录有我在万佛城讲陶诗时所写的四首绝句，记述了我在佛寺中讲《饮酒》诗的这一段超然于形迹之外的殊胜因缘。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陶潜诗借酒为名，绝世无亲慨六经。却听梵音思礼乐，人天悲愿入苍冥。

宣化上人之所以肯邀我在佛寺中讲授以“饮酒”为题的陶诗，那当然就正因为陶公此一组诗虽以“饮酒”为名，而其所写者实在乃是对东晋衰乱之世礼崩乐坏六经不亲的一份深慨。如果从悲天悯人之想要挽救颓风的一点心意来看，则当日写诗的陶公，和此日邀我去讲授

陶诗的宣化上人，以及肯到佛寺中去讲陶诗的我自己，也许我们可以说是都共同怀有一种人天之悲愿吧。我的粗浅的讲述，当然未必能传达出陶公的深远幽微的意蕴，但我却确实曾经诚摅地为此献上了一份心力。

以上五种较具系列性的《讲录》，其所以成书的因缘，既各有一段特殊的情况，固已如前所述。至于《迦陵说诗讲稿》及《迦陵说词讲稿》（上卷）两册书中所收录的文稿，则除去《说诗》一书中所收录的《旧诗的批评与欣赏》一篇，原为我在前文所曾提到过的1978年在美国东部夏令营中的一次讲演，乃是最早的一篇从录音被整理出来的讲稿以外，其他各篇大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两岸各大学或学术会议中的讲演记录。关于这些讲演的年代和地点，出版者赖阿胜先生都已在各篇文题之后分别加以注明，所以在此不拟更为辞费。不过此一编目内所收录的却并非我的被整理写定的讲稿之全部，除此以外，还有台北大安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唐宋名家词赏析》四册，及三民书局于1996年出版的《清词选讲》一册，与1997年出版的《好诗共欣赏》一册，这六册书也都是依据我的讲演被整理出来的文稿，但因为所属版权之关系，所以并未收录在桂冠所出版的《作品集》中的《诗词讲录》此一部分之内。至于这些年来我在各地讲学时，被主办单位录制的录音带、录像带其未被整理出版者还有很多，即如我于1990至1991年在台湾“清华大学”与台湾大学讲课的全部录音，1993及1994年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地巡回讲演及讲课的录音，历年来每次至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时，为当地各学术及文艺团体所做的多次讲演之录音，1997年春季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讲课三个月之系列录音，1998年春季在美国加州万佛城讲授杜甫诗之系列录音，近年在港台两地之讲演录音，还有多年来为加拿大之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所举办的各种诗词讲座之录音，与在渥太华为旅加大学校友及中文学校所做的多次讲演之录音。其中有些主办或邀请单位，除录音外且还制有录像带，我对所有主办和邀请的主人之盛意，都极为感激。

至于有些音带被整理出来，有些音带则没有被整理出来，这期间也各有一些偶然之机缘。一般说来，现存的讲稿大抵总是由于有人

索稿，而仓促被整理出来的，这些机缘既并非出于我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而我也更未曾想到这些临时为应付稿债而被整理出来的散乱的篇章，有朝一日竟会被汇集起来而编订成书，因此现在看来，这些讲稿实在显得浅薄、零乱，而且往往有相互重复之处。这是我个人对之极感汗颜的。如果允许我在此做一反省，我想这些缺点之出现，主要自然是由于我个人学识的浅陋，其次则是由于我个人之不肯事先准备讲稿。我之不肯事先准备讲稿，也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我的天性既疏懒，而工作又非常忙碌，因此无法抽时间去准备讲稿；其二则是由于我一向极注重诗歌中之感发作用，我总以为一定要讲诗的人先有所感动，然后才可以使听者也有所感动。如果把讲稿先写好了，则纵使字斟句酌写得极为仔细认真，等到临场再按照写定的稿子来读诵时，那也已经是一个死板固定的成品，而不再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生命了。所以我宁愿事先不写讲稿，等到在现场讲演时，才透过我自己当时的感发，来带动听众们的感发。我以为如此才能真正使诗歌获致一种不断在生发成长中的活泼的生命。记得著名的解析符号学的女学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曾经将诗歌语言的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被约定俗成的关系所束缚住的“被限制了的作用”（restrictive function）；另一种则是不被束缚的不断在生发变化的“成长中的作用”（productive function）。我所向往的诗歌讲授的最高境界，就应该也是同样带有不断生发成长之作用的一种境界。而这种境界既带有一种不能事先固定的质素，因此是否能完美地达成，自然就带有了许多不稳定的性质。

就以我个人讲演与讲课之经验而言，往往我所讲的虽是同样的题目和作品，但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听众，所讲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并不能由我自己完全控制的临场的差别。我个人以为我这种不备讲稿的习惯，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其不可取之处。其可取之处主要固在于富有生发感动之作用，而且纵然所讲的是相同或相近的题目，也不会有完全重复相同的内容。我想这很可能也就正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及桂冠图书公司两地的编者何以竟都决定不加删落便把一些题目相近似的讲录都编入了一本书中的缘故。至其不可取之处，则是因为我之讲演既注重感发之作用，因此在讲演开始后，总要经过一段酝



酿培养的时间，才能够把我自己和听众都带入到一种感发的意境中来，而如果讲演所规定的时间太短，则往往在进入到此种意境情况之后不久，便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所以与我熟识的朋友常会笑我每次讲演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常不免有虎头蛇尾之病。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所以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系列的讲座，因为一定要有较充裕的时间，我才能够畅所欲言。不过虽然同是系列的讲课，但场合与听众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如此一编目内所收录的《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虽也是系列的讲课，但因是在录音室中的播讲，缺少了现场的听众，因此就形成了较为偏重考证和诠释，而缺少了直接感发的气氛。又如《陶渊明饮酒诗讲录》一书，虽然有了现场的听众，但因听众们大多是出家人，使我总是感到有些拘谨，所以就不免也减少了一种任意发挥的乐趣。比较而言，我以为在这些系列讲座中，《唐宋词十七讲》可以说是我自己较为满意的一次讲座。这与主办者的安排、听众们的品质，以及讲演的场地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我是在一进入当时的场地之中时，就感到了听众们对古典诗词的一种热爱和理解的气氛，一千五百人的大礼堂，满座的听众不分年龄和职别，似乎极迅速地就都进入了感发的情况。关于此次“唐宋词系列讲座”之主办，及录音与录像之编排及整理的情况和过程，我在《唐宋词十七讲》一书之《自序》中，已有较详的叙述，兹不再赘。我现在只不过是面对今日即将出版的几册《讲录》的书稿，遂使得我对于自己一向讲课所表现的得失利弊，不免又引生了一些反省和回顾而已。

最后我更想藉此机会对于邀请我讲演并做出录音的所有朋友们，都在此表示深挚的感谢。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首先是《海内外》的编者尹梦龙先生，因为若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我根本不会想到要为自己的讲课和讲演做出录音，并整理成为文稿去发表。这自然是要特加感谢的。其次则是坚邀我去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并为此讲座安排录音与录像的辅大校友马英林学长，若不是他的热心邀请和安排，根本就不会有《唐宋词十七讲》这一册讲稿的出现，这自然也是要特加感念的（只可惜英林学长已于1992年病逝，我曾写有一篇《悼念马英林学长》的文稿，已收入《杂文集》中，读者可以参看）。至于为我整理